

欢
盟
研
究

观念、制度与政策

——欧盟软权力研究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 Study of European Union's Soft Power

● 秦亚青 主编

观念、制度与政策

——欧盟软权力研究

秦亚青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 / 秦亚青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5
(欧盟研究)

ISBN 978 - 7 - 5012 - 3346 - 5

I. 观… II. 秦… III. 欧洲联盟—研究 IV. D81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235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文字编辑 周宇君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王 铮
封面设计 徐威明 周 红

书 名 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
Guannian Zhidu yu Zhengce
—Oumeng Ruanquanli Yanjiu

作 者 秦亚青 主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 1/32 8 $\frac{5}{8}$ 印张
字 数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346 - 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前言 软权力与欧洲一体化道路 / 1
- 第 1 章：软权力理论 / 25
- 一、权力 / 25
 - 二、国际政治的变迁与权力性质 / 31
 - 三、软权力 / 39
 - 四、小 结 / 55
- 第 2 章：软权力要素及其测量 / 57
- 一、权力指数与测量 / 58
 - 二、软权力要素和测量 / 65
 - 三、软权力的可操作化方法 / 71
 - 四、文化理念要素 / 73
 - 五、国际制度要素 / 78
 - 六、政策要素 / 80
 - 七、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 83
 - 八、小 结 / 87
- 第 3 章：欧盟的新文化理念 / 89

一、导语 / 89

二、欧洲的和平意识 / 91

三、欧洲的合作意识 / 100

四、欧洲的共同体意识 / 115

五、欧洲新文化理念的影响与局限 / 128

第4章：欧盟的制度 / 140

一、欧盟制度的法理性 / 141

二、欧盟制度的网络化：制度共同体 / 155

三、欧盟制度的有效性 / 174

第5章：欧盟内外政策 / 191

一、概念范畴 / 191

二、欧盟对内政策及软权力评估 / 196

三、欧盟对外政策及其软权力评估 / 212

四、结 论 / 233

第6章：欧盟软权力的影响与局限 / 236

一、欧盟软权力的三种形式 / 237

二、欧盟软权力的局限性 / 248

三、小 结 / 269

前 言

软权力与欧洲一体化道路

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开启了一条不同于以前的国际关系道路，这就是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欧洲新的国际关系道路是对欧洲历史上多次战争的反思，尤其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是不再通过强权和战争展开国际关系的尝试，是和平与合作的实践。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欧洲从开始的三个功能领域合作，发展到欧洲联盟；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发展到 27 个成员国；从经济合作扩展到政治、军事、外交的全方位合作。这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实践活动，也是国际关系史上一次思想的变革。

国际关系的研究一直重视的是硬权力，是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国家之间争取生存的争斗，这些理念大多是从欧洲产生的。建立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后的欧洲，更是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战后欧洲的经历表现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态。欧洲不像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凭借其硬权力展开竞争和进行制衡，以军备竞争作为主要竞争形式，以确保相互摧毁作为和平的手段。欧洲更多地是通过其软权力

在国际舞台上运作、整合欧洲的力量。当今的欧洲之所以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有着诸多的原因，比如欧洲的经济实力。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一方面，欧洲半个世纪聚集起来的软权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软权力的概念，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实际上也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之为软权力的东西。在中国先贤的思想中，治理天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在所谓的软权力，比如儒家模式试图通过道德与和谐来实现永久和平及天下稳定，^①而道德和谐是典型的软权力而非硬权力。再如，礼制是儒家制度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以礼制为核心的治理和统治显然也是要发挥软权力的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制性权力来压服。即便是中国近代的辜鸿铭，也认为“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以德和力来区别软硬权力。西方软权力的概念也是早就已经存在的。像中国先贤一样，西方的思想家也将道德、理想、制度、规范等因素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软权力实际上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思想，是与统治和治理密不可分的概念，并始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即便是国际关系领域经典现实主义的重要学者，比如卡尔和摩根索，也都对基本属于软权力范畴的道德、舆论、外交艺术等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②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系统地提出软权力概念并持续加以论述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他自1990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软权力》一文首次提出“软权力”的概念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论述软权力问题，包括《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1990年）、《美国权力的悖论》（2002年）以及《软权力》（2004年）三本主要著作和一系列论文。^③

^① 黄凯峰：《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海外学者观点综述》，转引自：《新华文摘》，2007年第10期，第152页。

^②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参见第一章对约瑟夫·奈软权力研究的讨论。

自约瑟夫·奈对软权力的论述问世以来，软权力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研究成果已经问世。仅以中国为例，软权力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① 学者对软权力的概念、内容、意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软权力研究都存在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一方面，这是不同学者因为对软权力的实质性定义有差异；另一方面，软权力概念本身使人们对其比较难以做出可操作性的定义。不过，学界虽然对软权力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也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在这些共同认识基础上，是可以提炼可操作性的软权力定义的。对软权力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是将软权力研究深入一步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对已有的成果进行了积极的借鉴和认真的反思，希望实现三个目的。第一，给软权力下一个比较切实可行但并非包罗万象的定义；第二，提炼出当今世界政治中软权力的基本要素，以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的雏形；第三，将这一比较系统的研究用于欧洲的个案。

二

什么是软权力？

对软权力的定义已经很多。自从约瑟夫·奈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西方学者和不少中国学者都对软权力

^① 中国关于软权力的文章已经有几十篇，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软权力的一般性研究；第二类是国别软权力研究，尤其是中国软权力研究；第三类是比较软权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55—62页；韦宗友：《权力、软权力与国家形象》，《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第39—4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国际体系与中国软力量》，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21—27页。

做了定义。这些定义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有的基本接受约瑟夫·奈的定义，将软权力视为“吸引力”或是“同化力”；也有的认为奈的定义有很多问题，所以提出了新的定义。^① 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我们需要对软权力做出一个定义。

我们在本研究中将软权力定义为“权力施动者的非物质性、无形的资产所产生的，通过某种非强制性方式使权力受动者对施动者实现其目标的努力采取自动合作行为的能力”。这里包含了三个基本的因素：首先，软权力的基础是一个行为体所拥有的非物质性的、无形的权力资源；^② 其次，软权力的实施是非强制性的，是以权力施动者的吸引力和权力受动者的主动接受为基本标志的；第三，软权力的行为结果是权力受动者的自动合作。权力非物质性、非强制性以及权力受动者的自愿性构成了软权力的三个基本特征。

软权力又可以分为潜在软权力和实际软权力。潜在软权力指可能产生影响力的软权力资源，比如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传统；实际软权力则是感化影响力，也就是转化为影响力的软权力资源。比如，主权在300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已经形成了国际体系的一种主导观念结构，时时事事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国际行为，这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力。虽然主权是国际社会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事实，但它不仅成为制度，而且以内化了的制度形式成为实在的影响力。作为制度本身的主权是软权力的资源，作为实际影响到行为体行为的主权是实际软权力。这就是关于潜在软权力和实际软权力的一个例子。

作为资源的软权力，即潜在软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没有软权力资源，也就没有实际软权力。在下一节里，我会讨论软权力资源要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软权力和硬权力既是相互关联、又是可以分别分析的概念。一般来说，这两种权力因素是互为支撑。比

^① 对于软权力定义的文献性述评，参见本书第一章。

^② 行为体可以是个人、国家或是国际组织，本研究中的行为体是欧盟。

如中国在过去 30 年里，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内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对外以国际合作为基本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硬权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比如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等。同时，这些硬权力的加强也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许多国家效仿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还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思想。^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越南、老挝等国家效仿的、并且证明是成功的东西。

但是，并非只要有了硬权力就一定会具有软权力。北欧一些小国的硬权力显然不足，但是它们解决工业化产生的各种矛盾，包括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却导致了社会的高度稳定，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像梵蒂冈是没有什么硬权力的，但其宗教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反之，硬权力强的国家在使用其硬权力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重大失误，则可能损害其软权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硬权力并没有下降，实际上在冷战后仍然在上升，相对硬权力更是如此。但为什么美国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却在下降，这就是软权力的作用了。

所以，在实际运作中，软硬权力是相互关联的，但并不是必然共存的。所以，在分析过程中，软硬权力是可以分别研究的。

三

软权力资源包含什么要素？

对于欧盟这个特殊的行为体形式而言，有三个基本要素是软权

^①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2004.

力的重要资源因素，即：文化、制度和政策。^①

首先是文化理念。我们强调文化理念，主要是强调成为文化的观念。观念是人们的思想，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人们的世界观、宇宙观，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观。^②但是，思想可以是个人的或是自有的，也可以是一部分人持有的。只有某种思想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一种观念成为社会普遍支持和遵循的观念，它才成为文化理念。所以，这里的文化强调的是共有观念，是群体规范，是社会事实。

文化理念是软权力的最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观念成为共有观念，某种思想成为群体思想，它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这样的共有观念，由于得到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内化，就成为一种主导人们思想意识和指导人们行为的“无形之手”。比如，在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是市场经济。当年，亚当·斯密将市场称为“无形之手”，调控着人们的需求和供给。但更为强有力的无形之手是人们相信了的斯密理念，相信了市场经济并实行推广之。所以说，如果我们将软权力定义为吸引力，那么真正的吸引力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共有观念或曰文化。

欧洲的个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确立的。但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永恒问题上，二战之前的欧洲形成的

^① 我们在对现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三个要素，这也是在学者之间具有比较广泛共识的三个要素。国外学者虽然强调的方面不同，但大部分文献涉及了这几个要素。国内不少学者也分别强调了这些要素，比如，俞新天教授明确指出这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软权力。参见俞新天：《“软力量”断想》，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35—36页。

^② 我们这里文化的定义，是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有观点认为，文化就是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媒体、饮食娱乐等，这是一种非学术的常识性定义。这些因素都与文化相关，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的基本定义是社会的共有观念，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共有的理解，是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社会群体怎样理解战争与和平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等。

是一种什么文化理念呢？欧洲留给世界的是一种什么观念呢？是战争。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是战争文化。无数人至今仍然在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战争的确是政治的继续。但是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将战争视为必然的和正常的东西，是人类事务中的常态，就像政治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影响力。纵观欧洲历史，1000年之间爆发了500多次战争，死伤无数，血流成河。宗教之间的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成为造就英雄的宏伟史卷，成为国家利益的最高表征。欧洲一个又一个的凯旋门都是迎接战争胜利归来的英雄。今天，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游览宏伟的巴黎凯旋门。实际上，凯旋门反映的正是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文化和战争理念，凯旋门下骑马招摇的元帅将领哪一个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典范？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欧洲的主导战争观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人类事务中的正常现象。^① 这样的战争观在二战前的欧洲被普遍地接受下来。从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到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再到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和暴力的手段是主要的发展手段。称霸的国家也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强权实现国家目标，大国的权力更替更是不断引发体系战争。^② 这种战争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少人仍然认为战争是霸权交替的必然手段，是人类事务的正常事态。^③ 所以，冷战一结束，米尔斯海默就告诫人们，欧洲将会再次走向四分五裂、纷争四起的高度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不稳定时代。^①从根深蒂固的欧洲战争观来看，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均为欧洲，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二战之前的欧洲就没有和平的思想。在本书的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欧洲先贤对和平的渴望和他们想象的和平以及实现和平的方法。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共和自由主义，源头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在康德的思想中，国家不但可以处于和平状态，而且世界可以实现永久的和平。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条件，比如共和政体，作为国际法基础的自由国家联盟，以及普遍的善意等。另外，格劳秀斯希望通过国际法的约束，降低战争的伤害程度，亚当·斯密提出了进行自由贸易可以使贸易双方合作的基本思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开始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号召，试图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发生。

虽然这些欧洲先贤渴望并设计了和平，甚至提出了完整的和平思想体系，有些也被实践过，比如国际联盟。但是，近代国际关系历史的现实却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国联这类实践也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先贤的思想仍然没有跨出自有的思想的领地，仍然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个人理念。也许，一些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但是，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政治精英，并没有接受这些思想。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思想，而没有成为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欧洲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欧洲历来推崇的实力均衡思想是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战争的，因为它是以争夺霸权为基本动机，以强权制约强权，以小型战争换取体系

^① 米尔斯海默在冷战结束伊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欧洲在美苏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状态下的不稳定状态，对国际制度弱化无政府性的作用提出质疑，预言欧洲在实力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会进入高度不稳定时期。参见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pp. 5-56;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266 (August 1990): 35-50;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Winter 1995), pp. 5-49.

稳定，以大国利益牺牲小国利益。这样以大压小、以强欺弱、冤冤相报的状况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的。所以，他们希望用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的方式代替欧洲实力均衡的制度。但是，一战后的欧洲并没有形成一种非战文化，也没有普遍接受和平观念。所以，当德国再次崛起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些和平的思想便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在研究1919年至1939年这20年的时候，是以危机作为其基本特征的。他对当时欧洲的一些基本思想提出了质疑，对“国联”的设计嗤之以鼻，对所谓国际组织的和平使命和国家之间利益和谐的观点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卡尔认为当时这些乌托邦政治家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权力和权力格局，忽视了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①应当说，卡尔所说的危机的确是存在的，否则就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这种危机更多的是因为当时欧洲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和平的文化结构，传统的战争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忽视强制性权力，高估国际组织建构集体安全的作用，其思维和行为只能是乌托邦，结果也只能是爆发更加严重的战争。《慕尼黑协定》和“国联”的失败都是典型的历史实例。

二战之后的欧洲到底变的是什么？是观念，是一种不同于二战之前的、以和平为核心的欧洲国际关系文化。欧洲反思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历史，认识到通过强权和战争的方式保证国家安全和获取国家利益，虽然可能维持一时，但无法达成永久和平，也无法保证国家之间的真正合作。当然，一战后的教训也告诉他们，通过乌托邦的方式保证和平是不切实际的。也许，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历史作为镜子，可以使人看到过去的教训；同时，历史又是一盏航灯，告诫人们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而要在认识历史失误和错误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欧洲人开始通过功能主义的合作，从低政治领域

^① 卡尔：《20年危机：国际关系导论》。

开始建立和平与合作的共有观念。欧洲政治家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观念的革命。这个民族国家体系得以确立的地区，这个以战争为荣耀的场所，这个通过战争得到了无数的利益也付出永远无法弥补的生命损失的大洲，终于从战争中认识了战争的邪恶与恐怖。所以，从二战一结束，欧洲的有识之士就开始重建欧洲国际关系文化和战略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最根本的转折是观念的转变，即从传统的战争理念转变为和平理念。这种理念既是对欧洲先贤和平思想的继承，也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创新。说是继承，因为战后欧洲实施的实际上是欧洲先贤早已提出来的一些思想；说是创新，是因为战后的欧洲放弃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种乌托邦和平观，而是脚踏实地地通过一个又一个比较容易合作的领域的合作成果教会欧洲人认识合作与和平的巨大优势。当欧洲先贤的和平思想通过这些成功的合作及其成功的外溢效应扩展开来，不仅被精英而且也被民众所接受的时候，和平思想就成为和平文化，成为共有的理念。人类需要和平，人们崇尚和平，但真是将和平的思想转化为和平的文化，并非易事。而只有和平的思想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成为文化，稳定的和平才能够实现，战争才可能成为不仅仅是物质上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是人们根本不会考虑的事情。^①

欧洲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这种和平理念成为欧洲软权力的核心。与之相关的是合作理念和共同体理念。合作是和平的途径，首先在关键的功能性领域进行合作，使欧洲国家在能源等方面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争夺能源的战争就难以发生。功能领域合作的外溢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在更多的领域合作，最后逐步走向地区的一体化，并在一体化过程中，培养和构建集体认同，为形成安全共同体打下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合作的一再外溢和升级，米尔斯海默的简单历史类比至今没有成为现实，欧洲没有出现列国争霸的局面，

^① 这里调整了舒曼原话的顺序。舒曼的原话是：“... making war not merely unthinkable, but materially impossible.” 参见 Robert Schuman, “Schuman Declaration,” 9 May, 1950, <http://www.ccc.org.uk/whatsnew/schuman.htm>.

没有出现俾斯麦、梅特涅等欧洲政治家惯用的均势政策。欧洲没有退向未来，而是迈向未来。

欧洲现在的形态，很可能是国际关系的一种新的单位形态，一种介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共同体。如果仍然坚持以国家的标准去衡量欧洲的一体化，可能就会发现欧洲距离一个国家仍然十分遥远。虽然欧洲的一些政治家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使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欧洲的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但是欧洲要想成为美国那样的欧罗巴合众国不但十分困难，而且也许不是欧洲民众所希冀的事情。

四

我们设计的第二个软权力资源指标是制度，因为制度是使思想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基本途径，是影响行为和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思想发展成为文化，需要诸多的因素，其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当某一种思想产生之后，单凭一些支持这种思想的人去宣传、甚至去实践，都是不够的。^①没有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思想是难以成为文化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主导文化思想，是因为历朝历代将儒家的思想转化成为制度，并且将这些制度从家庭到朝廷、从一己到天下，通而贯之。^②

制度是一种非物质资源，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制度权力的行使和产生影响的过程更多地是通过软的方式。纵观中国的和世界的思想史，无论是圣人还是先贤，都是在人类制度上苦思冥想、大做文章的。儒家设计的天下制度不仅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维系着一个巨大的王朝体系，而且管理了整个东亚的朝贡体系。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国家，主要是学习和实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有

① 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332页。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人说，中国的两千年王朝体系是一个超稳定体系，而维系这种体系的就是体现儒家核心思想的制度。在中国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制度既是思想转化为文化的途径，又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保障；既是思想者的思想归宿，又是革命者的革命对象。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制度对人的命运和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现了人的理性，建立了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原则。于是，在科学领域，欧洲人做出了重大的突破，率先进入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标志的现代化时代。牛顿力学、瓦特蒸气机是这一时代的标志。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思想意识领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实践领域，更重要的发现或发明则是制度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家的最高成果是制度设计，发明制度比发明技术更具影响力。欧洲许多思想家从考察人性和预设前社会状态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社会更合理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进步。比如，孟德斯鸠认为人本性欲权，过度权力导致滥用权力，所以提出分权和权力制衡。洛克认为人性属善，他思考的前社会是一种和谐状态，只是由于少数人的恶性，才使大多数人乃至整个社会受到损害。所以，洛克设计的社会制度是小政府，是契约制。而霍布斯认为人性属恶，预设的前人类社会是“自然状态”，是人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争斗”。在这种霍布斯丛林中，只有利维坦这样的力大无比的怪兽才能实施强制性的和平与安宁。所以，他设计的制度必然包括强大的政府和强制性的力量。

制度之所以是软权力要素，是因为制度将思想落实到社会、使思想形成文化。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思想在被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被用来建立制度，进而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会直接影响行为。市场经济的制度主要来自亚当·斯密的思想，但是当时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的时候，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建立的经济贸易